

阿拉伯语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

谢秩荣

阿拉伯语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中古时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强盛及阿拉伯文化的繁荣，阿拉伯语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阿拉伯语修辞学如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阿拉伯语修辞学的产生

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贾希利亚时期（475—610年），修辞活动已是十分活跃。易于记忆和口耳相传的诗歌是当时的主要文体，备受推崇。在部落纷争中，每个部落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杰出诗人，以歌颂本族的荣耀，鼓舞族人的激情，揭露对方的耻辱，挫伤敌人的士气。因此，一旦有这样的诗人脱颖而出，便在本部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为获此殊荣，诗人们无论表情达意还是写景状物，都十分注意锤炼词语和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有的诗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成之后，反复斟酌，仔细推敲，润色一年后才予以发表，因此有“年诗”之说。在欧卡兹集市一年一度的赛诗会上，诗人们竞相献技，一旦某位诗人的作品得到赞赏，便立即名扬四方。有些公认的佳作则用金水抄录在亚麻布上，挂于克尔白天房，称为“悬诗”。从这个时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比喻、比拟、借代以及对

比、谐音等修辞手段。

伊斯兰教产生（610年）以后，《古兰经》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文体，它是散文，却散而不乱，句式长短相错，松紧有序，同时又兼有诗歌的特点，注意音节的和谐和宽式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听起来非常悦耳，富有音乐感，并根据题旨情境的不同，语气时而严厉，时而柔婉，风格时而繁丰，时而简约，并且大量使用比拟、比喻、夸张、反复、排比、对照、反诘、呼语等各种修辞手段，被认为是阿拉伯语修辞学的最高典范，凡人不可效仿的“奇迹”（الإعجاز），对阿拉伯语修辞及其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个时期，宗教迅速传播，帝国疆域迅速拓展，阿拉伯人逐渐由游牧进入定居，思想文化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传教和征战的需要，也由于不同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和斗争，讲演艺术得到发展，诗歌题材得以拓宽。诗人们不再像以前在茫茫荒漠中那样难于相见，现在他们随时可以相聚在哈里发宫中，王公贵族府前，甚至在集市上或清真寺里，既竞相展现诗才，也相互切磋诗艺，当然也少不了有关遣词造句、修辞达意的讨论，甚至由于相互批评指责对方诗歌中用词不当或表达欠妥而引起唇枪舌战。

到了阿拔斯朝前期（750—945年），对科学文化的重视，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营造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思想学术氛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许多非阿拉伯人，特别是波斯人精通阿拉伯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用阿拉伯语进行译著，不仅使诗文的内容和题材得以深化和拓展，而且也融入他们本民族的修辞见解，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词汇及表达形式。波斯人伊本·穆格法（724—759年）就是杰出的代表。他翻译了大量的波斯文学作品和典籍。其译著《卡里莱与

笛木乃》文字优美质朴、凝练流畅，充分体现其“简洁即修辞”^①的思想，并且大量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成为后人效法的修辞典范。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在语言研究著述中，也提出了不少修辞上的见解。但真正推动修辞研究发展的是教义学家。由于教义上的分歧，自伍麦叶朝（661—750年）以来，出现许多教义学派，其中穆阿泰齐赖学派影响最大。这些学派常常在巴士拉、库法以及后来的巴格达等地进行激烈的论战。为了在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潜心研究讲演艺术和修辞技巧，不仅在语言上下功夫，而且还求教于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以提高思辩和论证能力，同时还研究和吸收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等民族的修辞见解和技巧。贾希兹（الجاحظ، 775—868年）的《修辞达意》（البيان والتبيين）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在问及什么是修辞时，贾希兹作了这样的介绍，“波斯人说：‘善于断句和连句’，希腊人说：‘准确表义，锤炼词语’，罗马人说：‘该简则简，应繁就繁’，印度人则说：‘表义清楚，用词适时，暗示得当’。”^②这些见解后来对阿拉伯语修辞学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如果说在此之前阿拉伯人积累了丰富的修辞实践，并且有不少修辞方面的见解，但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辞研究，直到穆阿泰齐赖学派出现后，才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人的修辞活动，并吸收其他民族的修辞成果，进行系统的修辞研究，以探索其中的规律。这种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贾希兹。

贾希兹是穆阿泰齐赖学派贾希兹支派创始人，一生博学强记，遇书必读，既通晓阿拉伯文化，又熟谙其他民族文化，成

① 贾希兹《修辞达意》，第一卷，第116页，埃及哈内基出版社，1960年。

② 贾希兹《修辞达意》，第一卷，第88页，埃及哈内基出版社，1960年。

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著作宏富，但多已散失，修辞方面的传世之作主要是《修辞达意》和《动物书》。

《修辞达意》一书主要收集了当时阿拉伯人在修辞上的实践和见解，为后人的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例证。更重要的是，贾希兹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作了大量深入的分析。另外，他的《动物书》虽是一部文学著作，但在第四卷和第五卷中却讨论了比喻、借喻等不少修辞方面的内容。

贾希兹十分强调言语必须符合语境和听众的身份。他认为“正如人们分为不同的阶层一样，言语也有不同的层面。有庄有谐，有雅有俗，有的明快，有的滞重……我认为粗俗的语言必含粗俗的意义，但有些场合却需要粗俗，因为它比典雅来得更生动”^①。而且“各行各业均有其熟悉的词语，教义学家用他们的术语与家人、邻居和普通百姓谈话是不妥的；同样，也不能用贝都因人和普通百姓的语言去讨论教义学。各种场合有其言语，各种文体有其风格。”^②

其次，他还详细讨论了简洁与周详及其适用范围，认为简洁与周详“并非指词语多寡，而是以意义表达是否清楚、是否合乎语境为标准，也许长篇阔论却言简意赅，反之亦然。”^③

在词语方面，贾希兹认为“词语的意义之于形式犹如灵魂之于躯体”，“最好的话语是文辞精炼，含义明确……如果意义高尚，文辞优美，章法正确，无雕饰造作，则动人心弦，沁人心脾，如甘霖滋润大地。”^④

在强调意义的同时，贾希兹也强调词语的形式，强调合理

① 贾希兹《修辞达意》，第一卷，第144页，埃及哈内基出版社，1960年。

② 贾希兹《动物书》，第三卷，第368页，穆斯塔法出版社。

③ 贾希兹《动物书》，第一卷，第91页，穆斯塔法出版社。

④ 贾希兹《修辞达意》，第一卷，第83页，埃及哈内基出版社，1960年。

安排音韵节奏。他在《修辞达意》中多处讨论词语的声音、音节、韵律及其修辞效果。并且批评有些译作只重意义，忽略词语搭配和声音协调，读起来拗口，听起来刺耳。

此外，贾希兹还在列举前人例证的基础上，讨论了大量的修辞手段，如比喻、借喻、借代以及妙答、形谐实庄、委婉、暗示等。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阿拉伯语修辞研究是零星的、分散的，那么，贾希兹则是有意识地对阿拉伯语修辞进行较系统的研究，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他在《修辞达意》以及《动物书》的部分章节中所记录的修辞例证，提出的见解和术语，一直被后人引用，成为修辞研究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贾希兹不愧为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奠基者。

二、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发展与繁荣

贾希兹之后，阿拉伯语修辞进入系统研究的发展阶段。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古希腊哲学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对当时的文坛和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修辞学如同诗歌散文创作一样，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融中，形成传统和革新两大分野。前者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后者则完全吸收古希腊哲学思想和修辞学说。处于两派之间的是把传统与革新相结合的穆阿泰齐赖学派。各种学派为宣传自己的学说，纷纷著书立说，不断地推动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

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修辞专著是阿卜杜拉·伊本·穆阿太兹（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معتز، 861—908年）的《修辞》（البدیع）。作者曾任阿拔斯朝哈里发，是守旧派的代表，其著书目的如该书前

言所开宗明义：“本书列举了在《古兰经》以及前人的诗歌话语中业已存在的被后人称为修辞的部分例证……，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在修辞的各个方面，后人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①以此回击崇拜希腊哲学的革新派和诋毁阿拉伯人功绩的舒欧比主义。

《修辞》一书，主要讨论了借喻、谐音、对照、词语前后呼应、教义学派的思辩证方法和十三种藻饰修辞技巧，如呼语（人称变换）、插入、岔题、形贬实褒、形谐实庄、包含（引用）、暗示、过分修饰（夸张）、多重押韵等。

伊本·穆阿太兹不仅为所讨论的各种修辞方式下了明确的定义，而且引用了大量的例证包括使用不当的反面例证加以论述。他在《修辞》一书中所讨论的修辞方式后来成为藻饰修辞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书名（البدیع）后来成为“藻饰修辞”的专用名称。

崇尚希腊哲学的革新派则主张全面吸收古希腊修辞学说，不仅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讲演术》全部翻译过来，而且试图按照希腊人的修辞学说来建立阿拉伯语修辞体系，古达麦·本·贾法尔（فدامة بن جعفر، ?—948年）就仿照亚氏《诗学》、《讲演术》著有《诗论》（نقد الشعر）和《文论》（نقد النثر）。然而，不同的语言毕竟有着不同的修辞体系，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况且这些哲人们的著述又过多地使用缜密的逻辑和思辨，致使隐晦难解，终于和者甚少，影响不大。

这个时期，教义学家们仍然在修辞领域里辛勤地耕耘着。虽然已是阿拔斯朝后期（945—1258年），帝国四分五裂、国力日益衰竭，但由于文化发展的持续性和滞后性，阿拉伯文化仍

① 阿卜杜拉·伊本·穆阿太兹《修辞》，第73页，贝鲁特吉尔出版社，1990年。

然持续繁荣了一段时间，修辞学也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不少修辞著作和基于修辞研究基础上的文学评论。这些著述从不同的侧面对修辞学进行了探讨。但真正把阿拉伯语修辞学研究推向高潮的是阿卜杜·高希尔·朱尔加尼（عبد القاهر الجرجاني، ?—1078年）的《奇迹例证》（دلائل الإعجاز）和《修辞奥秘》（أسرار البلاغة）。

朱尔加尼生于波斯朱尔坚，是艾什阿里学派的教义学家，出于对本学派的偏爱，他对以贾希兹为代表的穆阿泰齐赖学派修辞学家认为的修辞效果既来自于词语的形式也来自于词语的意义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修辞效果好坏、表达是否恰当不是取决于单纯的词语，而是在于连词成句以及章法结构及其产生的效果之中，他说：“就单纯的词语来说，无好坏优劣之分”，“如果有人说什么词用得对，是因为他考虑了这个词在结构中的位置，它与前后词语在意义上的贴切，以及与其他同义词相比有不可取代的作用。”^①

朱尔加尼也强调词语的意义，但强调的不是词语的本义，而是“附加义”。而这种“附加义”正是来源于词与词组合后形成的词组或句子等新的结构之中。基于这种思想，朱尔加尼把言语的修辞特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其优点和美妙归于结构。另一类则归于词语，即借代、借喻和借喻基础上的形象比喻以及一切在本义上的转义、扩展及变异。”^②

朱尔加尼吸收了西伯维（سبويه）等语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奇迹例证》一书中详尽地讨论了各种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中因词序不同而产生的修辞意义，即附加义。如陈述句的主谓项搭配，谓项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可以确指也可以泛指，

① 朱尔加尼《奇迹例证》，第31页，开罗书社，1961年。

② 朱尔加尼《奇迹例证》，第301页，开罗书社，1961年。

可以在主项之前，也可在主项之后等，结构不同，意义也各不相同。

同时，他还讨论了虚词的特殊用法、句子之间的分断与连接、陈述句的强调方式、句子成分的限定手段等。

由于《奇迹例证》讨论的主要是章法结构或者说句式的修辞意义，即“附加义”，因此，后来的修辞学家在《奇迹例证》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把除形象修辞之外的内容独立成修辞学的第一部分，叫“意义修辞”（علم المعاني）。又由于该部分内容大都涉及句子结构的修辞，国内有的学者译成“句式修辞”。

朱尔加尼在《修辞奥秘》一书中主要讨论词语方面的修辞，而且认为词语方面的修辞仍然要从词语搭配的结构之中去考察。该书首先讨论谐音和押韵，并认为谐音和押韵虽然能给人以美感，但在使用时必须服从意义的需要，以免因文害义。

然后讨论比喻、借喻和形象比喻，他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首先讨论本义和转义，然后再讨论比喻、形象比喻及借喻，因为转义包含比喻，而借喻只是比喻的分支，讨论问题理应先总后分。这无疑为后来的修辞学家研究形象修辞指明了研究方法，尽管他本人并未这样做。

他首先讨论借喻，并把借喻分为名词性借喻和动词性借喻两种，这就是后来修辞学家所说的本体借喻和派生借喻。同时又把名词性借喻分为真借喻和象征借喻，即后来的明借喻和暗借喻。应该指出，朱尔加尼把象征借喻（暗借喻）和动词性借喻（派生借喻）归于借喻有些勉强，不如把这种修辞方式单独分类，称为比拟更合适一些。

接着详细讨论借喻中本体与喻体的关系，并分为三类：一是其相似点由抽象到具体，如借光明喻真理，二是由具体到具体，如借粪堆上的青草喻下层人家的美女，三是由抽象到抽象，

如借死亡喻愚昧。

然后讨论比喻和形象比喻，并把比喻分为一般比喻和特殊比喻，前者一看即懂，如以玫瑰喻脸颊，以黑夜喻秀发，后者须略加思索才能理解，如“文通辞畅似流水”（ألفاظ كالماء فى السلاسة），即清新爽口。而形象比喻则是比喻的一种，它的本体和喻体不再是单个事物，而是由多个事物相互交织而成的画面，如：“黎明驱赶着黑夜，犹如我们惊飞白色边翼的乌鸦”（كأننا وضوء الصبح يستعجل الدجى نظير غرابا ذا قوائم جون）。形象比喻多由复合比喻组成，它与多重比喻有明显区别，后者中的多个事物不是相互交织，而是分项列举，如描写美女：“露面如明月，行走似柳枝，气息如芳香，回眸似羚羊。”

接着举例说明比喻的修辞效果，认为它把高深的化作浅显的，把陌生的比拟成熟悉的，把抽象的比喻成具体的，而且本体喻体之间的差别越大，产生的修辞效果就越强烈。

朱尔加尼列举了大量实例，深入论述了一般比喻与形象比喻、比喻与借喻的区别，比喻使用的贴切与否、比喻的沿用与创新等，内容丰富翔实，足见朱尔加尼在比拟系统上的深入研究。

《修辞奥秘》最后讨论转义，并把转义分为词语转义和句式转义。词语转义又称字面转义，即“由于某种关联，词语被用在本义之外的其他意义中”。^①这种关联就是语词本义与转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分为相似及非相似两种，相似关系的转义就是前面讨论过的借喻，因此，所有的借喻均为转义。非相似性转义则情况较为复杂，如“阿里赐予我的手（恩惠）太多了”（كثرت أيادى على عندى），“手”转义为“恩惠”，前者是后者的

① 朱尔加尼《修辞奥秘》，第317页，贝鲁特吉尔出版社，1991年。

原因，属原因转义；又如把“眼睛”（عين）转义为“监视者”（رقيب）是局部转义；又如“会场安静下来”（استتب المجلس），是以地点代所在的人，是地点转义。后来的修辞学家把这些非相似性转义统称为相关转义。句式转义又称抽象转义，是把动词性谓项与非动作发出者的主项搭配在一起，如“艾米尔建造了城墙”（بنى الأمير السور），艾米尔只是下令者，真正的建造者是工匠。

朱尔加尼在《修辞奥秘》中几乎涉及了后来被认为“形象修辞”（علم البيان）的全部内容，因此，“如同他为阿拉伯语首创句式（意义）修辞理论一样，也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形象修辞理论。”^①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后人一致认为朱尔加尼分别以《奇迹例证》和《修辞奥秘》系统地创立了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但朱尔加尼本人并无这种划分。在他看来，“一切被后人称为句式修辞、形象修辞、藻饰修辞的东西都属于一门科学即修辞学，或者说语言表达美学。”^②

真正提出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并使之成为修辞学中两个独立部分的是宰迈赫谢里（الزمخشري، 1075—1144年）。他生于波斯花拉子模的宰迈赫谢尔，属穆阿泰齐赖派。修辞学方面的著作有《探索》（الكشاف），该书由于对《古兰经》作了出色的诠释而使他在世时就蜚声伊斯兰世界。书中，宰迈赫谢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是组成阿拉伯语修辞学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且声明他研究修辞的目的，就是要以修辞为手段对《古兰经》进行注释，去探求《古兰经》的修辞奇迹，以完成他作为教义学家的使命。因此，他全面地吸收前人特别

①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218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②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190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是朱尔加尼修辞研究的成果，并运用朱尔加尼的修辞理论以及他所提出的每一种修辞方式，结合《古兰经》中相应的实例，对经文加以详细的阐述和注释。宰迈赫谢里继承了朱尔加尼的修辞体系，并在句式修辞部分增加了命令句、疑问句、禁戒句等非陈述句的修辞意义。在形象修辞部分丰富了朱尔加尼未能详细讨论的借代。在借喻方面，增加了反借喻。另外，在朱尔加尼讨论了强借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弱借喻。在相关转义方面，宰迈赫谢里在朱尔加尼讨论了原因转义、局部转义、地点转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整体转义、过去状况转义、将来状况转义、结果转义等。在句式（抽象）转义方面，增加了宾语转义，如“满意的生活”（عيشة راضية），时间转义，如“白天斋戒，晚上礼拜”（نهاره صائم وليله قائم），地点转义，如“行走的道路，流动的江河”（طريق سائر ونهر جار）。

至于传统修辞学中第三部分藻饰修辞，“宰迈赫谢里也和前人一样认为不属于《古兰经》修辞奇迹的范围”^①，故只是把它作为修辞学的附录加以讨论。

总之，宰迈赫谢里继承了朱尔加尼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其讨论过的问题和未加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丰富和补充，使传统阿拉伯语修辞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前两个部分“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得以系统和完善。

三、阿拉伯语修辞学的衰落和现状

如前所述，阿拉伯语修辞学的研究到朱尔加尼时期达到空前的繁荣，并在宰迈赫谢里手中趋于系统化和完善。然而，“似

①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265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乎这两位旷世之才以其精辟的论述使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以致此后几百年间的学者为之倾倒，除了把他们两人的见解奉若神明、潜心学习外，未能取得任何重要的建树。”^①他们只满足于对前人成果的归纳和概括，这种归纳和概括内容简略，章节严密，类别精细，定义艰涩，因而需要专门著书加以注释，有时这种注释仍然模糊难懂，于是又在注上加疏，而且这些注疏不是以丰富的实例去阐述修辞现象，而是充满哲学、逻辑学、语法学等理论和概念，使修辞研究失去了“培养鉴赏力，发掘言语美”的应有功能。

开这种风气之先河的是法赫尔丁·拉齐（فخر الدين الرازى，1149—1209年），他著有《奇迹研究要略》（نهاية الإيجاز فى دراية الإعجاز），主要概括朱尔加尼《奇迹例证》和《修辞奥秘》讨论的内容，并加以重新分类。成就较高的是赛卡基（السكاكى，1160—1228年），代表作为《学问纲要》（مفتاح العلوم）。《学问纲要》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词法包括小派生、大派生、更大派生，中篇讨论语法，与修辞学有关并使他成名的是该书的下篇。

赛卡基在《学问纲要》（下篇）中，以其教义学家的思辨，充分运用逻辑学的归纳、综合、分析、类比等方法，对朱尔加尼、宰迈赫谢里等人在修辞学上的理论和见解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仍然沿用宰迈赫谢里的体系，把阿拉伯语修辞分为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两部分，并对各部分的小类分别加以严格的区分和定义。对被后人称为藻饰修辞的内容也分为字面修饰和意义修饰两大类、几十个小类加以讨论。尽管赛卡基本人没有把这部分内容称为藻饰修辞，但他把它与句式修辞和形象修辞加以严格的区分，在客观上使这部分内容独立成阿拉伯语修

^①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271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辞学的第三部分“藻饰修辞”(علم البديع)。因此可以说,赛卡基为传统阿拉伯语修辞学包括句式修辞、形象修辞和藻饰修辞的体系作了“最终的定型”^①。

从赛卡基起,阿拉伯语修辞学研究从此停滞不前,几乎没有具有科学价值的创新与发展。虽然历代修辞学者著述颇多,但只满足于对前人经典著作的注疏和辞格类别的细分。然而由于过于精细的分类、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化的阐述,又缺少生动的修辞实例分析,“修辞学变成了一门十足的学究式的学问,除了枯燥无味的定理和规则以外,未能提供任何愉悦和美感”^②。

阿拉伯语修辞研究逐渐走向僵化和衰落有着诸多社会文化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存在一些弊端:

(一)研究目的局限性太大。大多数修辞论著都限于阐述和论证《古兰经》的修辞“奇迹”。在众多的修辞著作中,“奇迹”、“《古兰经》奇迹”、“圣典奇迹”等字眼随处可见,并常常与“修辞”同义,甚至直接作为书名加以引用。这种研究必然有其局限性,只注意研究和论证《古兰经》的修辞“奇迹”而忽视语言在其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运用,对语言的运用起不到评价和指导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不妥。只满足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或注疏,很少创新,过多地借鉴或使用哲学和逻辑学的分析论证方法、甚至术语和概念,使修辞研究变得枯燥无味,逐渐背离其应有的功能。

(三)例证多为古诗和《古兰经》。这在修辞学产生之初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采用这些例证未免显得年代久远,越来越远离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生活及言语实践,

①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288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② 邵基·戴伊夫《修辞的历史与发展》,第288页,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使修辞研究不能动态地跟踪和反映修辞活动的发展。况且古诗基本上以行为单位，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所引用的《古兰经》例证也多为单句。因此，除讨论句子的分断与连接外，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大于句子的单位。

（四）研究范围不确定。其中夹杂着许多属于语法学、语用学范围的内容。另一方面，内部分类也不尽合理，艾明·胡利(أمين الخول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修辞分为句式、形象、藻饰三门学科是毫无裨益的。修辞研究应该包括词、句子、段落和篇章，而不仅限于句子”^①。

遗憾的是，这种传统修辞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虽然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传统阿拉伯语修辞研究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对传统修辞学进行革新。但是，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如何构建新的更合理的修辞体系，学者们看法不一，所作努力也不同。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修辞学或文体学的学术专著，还是大学和中学的讲义和教科书，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修辞体系，只是对划分过于精细而且复杂无用的辞格作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增加了部分比较通俗的例证，分析和叙述也比以前简洁明了，但仍未打破传统修辞学的旧框框。“主张革新阿拉伯语修辞研究的呼声影响极小，效果甚微，步履极其艰难”^②。

① 转引自穆罕默德·阿卜杜·蒙伊姆·赫发吉《呼唤新修辞》，第177页，格里卜出版社。

② 穆罕默德·阿卜杜·蒙伊姆·赫发吉《呼唤新修辞》，第181页，格里卜出版社。